

印章的起源流传和中国古玺

韩回之

内容提要：印章是今天大家对印记的通称，古代中国有称“玺”或“章”，意义与之相近。西方的古代文明也有类似的词汇：如萨珊波斯王朝使用的印章，在巴列维语中对应“muhr”一词；古埃及曾使用 Ω 这一象形文字符号来代表印章^①，是对滚动的滚筒印章的形象描绘。这些词汇的使用目的和方法基本和我国的“玺”、“章”一致。此处姑且用印章一词指本文要讨论的对象，即可以在特定的载体^②上留下戳记，用于表示签署、鉴定、见证等效用的实用物品。一件印章通常代表了个体或社会团体的特定身份。

印章起源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根据这些地区出土的印章和封泥的位置和分布状况，我们认为其最初是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而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印章的应用领域才逐渐延伸到贸易和行政。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伴随着文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往，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本文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首先确定印章起源的地点和年代，然后演绎出印章在地中海、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包括印度西北部）的传播脉络（图1^③）。最后，我们将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古玺的起源做出大胆推测，并通过和西方印章的比较，阐述中华印章崛起的必然和特定优势。

关键词：印章起源 印章传播 中国古玺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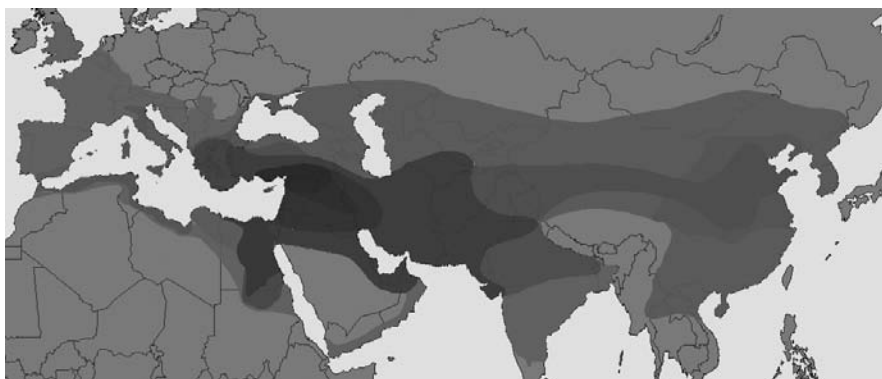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古代印章传播示意图，颜色越深代表印章使用在对应地区的起始年代越早

① 参考Sparavigna 2009 [1]，第16页。

② 如石膏、黏土、蜡、火漆、印泥、金属等。

③ 由于印章传播的复杂性，以及部分地区考古资料的匮乏，不可能很精确地绘出所有地区的印章使用起始时间。对于无法确定的区域，我们倾向留下空白；而对于在印章传播上和已知文明具有关联性的一些区域，我们会使用一个相对保守的起始时间。

印章起源

从尼罗河谷、尼罗河三角洲到地中海东岸，再到两河流域的弯月形地带，通常称为“富饶新月”地区。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有着温暖潮湿的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因而成为人类文明诞生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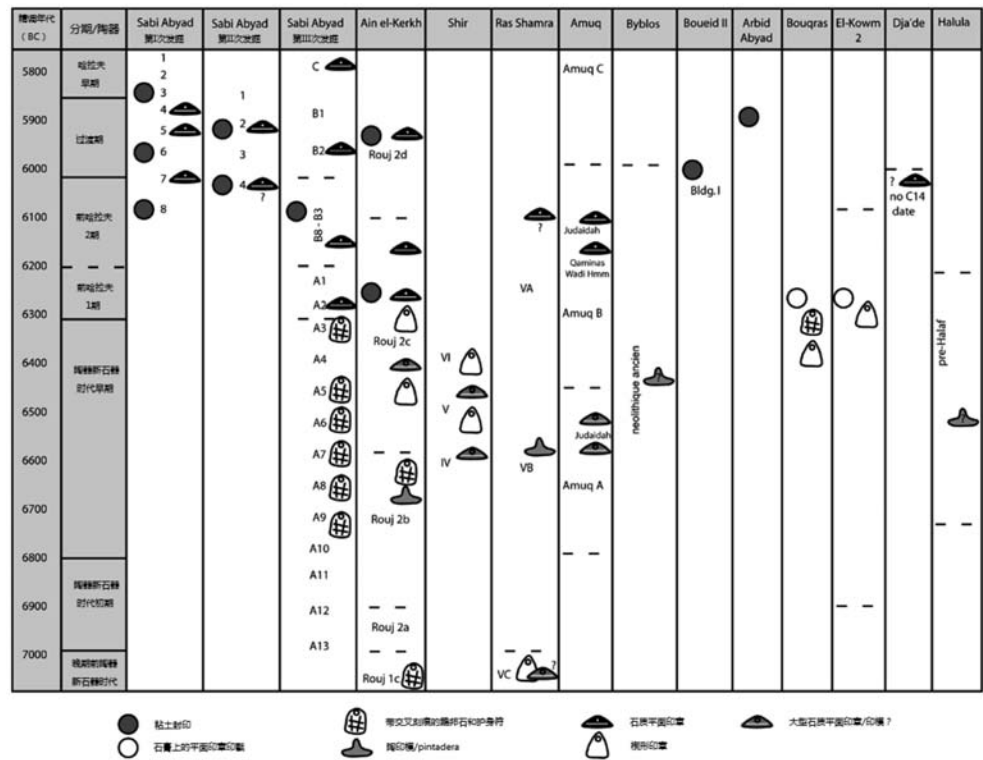
公元前7000年前后^①，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即“富饶新月”的弧形顶端）分布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型聚落以及少量的大型聚落，农业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采集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②。我们在这些地方首先看到了印章雏形的出现——在叙利亚的Sabi Abyad、Ain el-Kerkh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③先后出土了如下器物：

带有刻画纹的鹅卵石护身符，其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刻画，其复杂程度不足以作为印章使用。（图2）

陶质印模（pintadera），在这些印模上发现了染料的残留，所以判断其功能为文身或染色。（图3）

石质的类似印章的器物，其中一些体型远大于普通印章。

附表 叙利亚各遗址出土的早期印章、封印和印章雏形^④



① 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定义为前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B段（PPNB）至早期陶器新石器时代（PN）之间。
② 参考Duistermaat, 2012 [3], 第3页。
③ 参考Duistermaat, 2010 [2], 第176—179页。
④ 采自Duistermaat, 2010 [2], 第168页，分期和图例中的中文为本文作者翻译。

这一时期尚无带有戳记载体的出土记录，但是考虑到部分印章雏形在纹饰上已有较高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标示个人身份的功能，甚至很可能已经在作为印章使用，只是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对应的载体。

约在公元前6300—前6000年之间，叙利亚的Sabi Abyad和Ain el-Kerkh出土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带有戳记的封泥（图4），其纹饰具有较高多样性并且和同时期的印章器物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作为私有制和个人身份的具体体现，实用印章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地区使用。

通过考察Sabi Abyad等遗址出土的封泥及其该考古遗址的其他内容物，Kim Duistermaat认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用途并非贸易或社会行政管理，而是主要用于聚落中私人财产的集中封存，并可能用于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这种集中式仓储和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恰恰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的标志。由于农业发达程度上的限制，当时叙利亚地区的聚落采取半游牧的生产方式，部分族群成员会定期参与放牧并离开定居地^①。在这一过程中，由专人管理他们的私有物品，并通过加有戳记的封泥封存^②，便可保证这些成员私有财产的安全，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放牧劳作，这样便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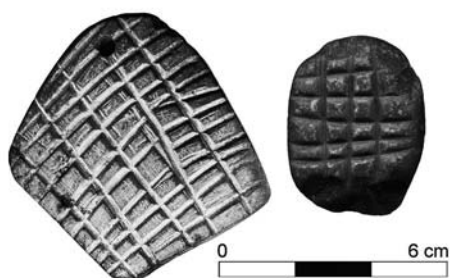


图2 Sabi Abyad出土的带刻画纹鹅卵石护身符，早期陶器新石器时代，采自Duistermaat 2012[3]，第5页



图3 Sabi Abyad出土的印模，早期陶器新时期时代，采自Duistermaat 2010[2]，第1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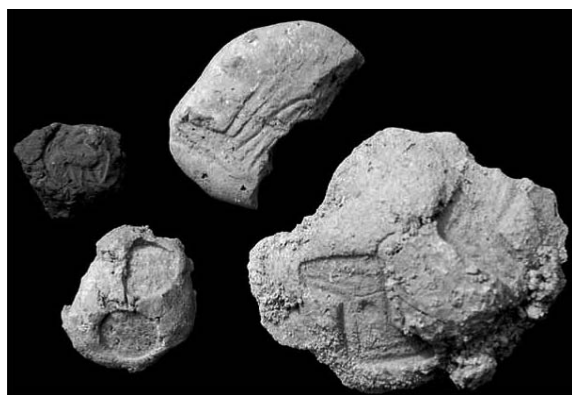


图4 Sabi Abyad出土的带戳记封泥，公元前6100—前6000年，采自Duistermaat 2010[2]，第173页

① 参考Akkermans和Duistermaat 1996 [4]。

② 根据考古资料，可以推测封存的主要为奢侈品、原料或和大宗物资对应的筹码（货币雏形）等。

最晚到公元前6000年，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多个遗址都发现了使用印章的证据^①。显然，这一更为高效的经济手段为这一地区的族群效仿，并迅速普及。

从纹饰上看，带刻画纹的护身符和陶质印模上以几何纹饰为主，同时期的陶器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些抽象的纹饰代表了使用者的信仰，并可能具有护身符的功用。相比之下，早期印章和封泥上的纹饰则包括几何纹饰和动物、植物等自然纹饰，这些自然纹饰可能和印章实际的用途相关^②，从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③。

我们也注意到Sabi Abyad出土的一些最早的封泥上的戳记并不能对应同一遗址层的出土印章，却和晚期遗址层或其他遗址的印章相似，例如：Ain el-Kerkh出土的封泥可以和Sabi Abyad出土的封泥对应。另外，前文提及的出土年代较早的石质印章型器物功能也尚不明确。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印章和用印体系的起源过程尚无明确的答案。

史前印章的传播和发展

印章的早期传播

公元前6000—前5000年的哈拉夫时期，平面印章（图5）^④已然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多个遗址中普遍使用^⑤，同时在伊朗西南部也有印章出土^⑥。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最早过渡到哈拉夫文化的遗址在两河流域北部，而这一非入侵式^⑦的文化过渡此后广泛地发生在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南部^⑧。在哈拉夫文化遗址中，我们注意到了经济手段和工具上的进步和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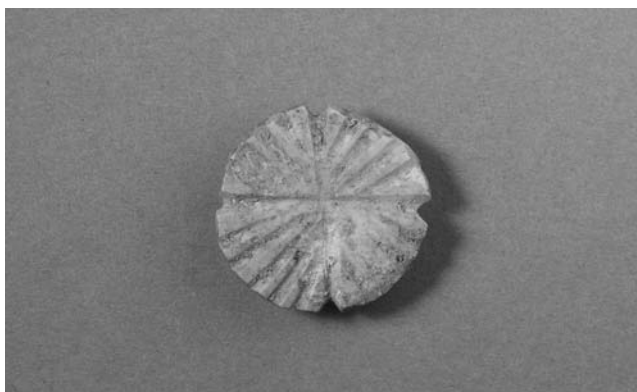


图5 哈拉夫时期（公元前6000—前5000年）平面印章，黄色石质，来自私人收藏

① 参考Duistermaat 2010 [2]，第179—180页，以及朱晓丽2013[5]，第32—34页。另，据Duistermaat的另一份研究资料（Duistermaat 2012 [4]），安纳托利亚出土的“陶质印章”应归于染色用印模更为妥当。

②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印章纹饰上的动植物代表了仓储的货物类型。

③ 参考Duistermaat 2012 [3]，第5—8页。

④ 特指印面为平面的印章。

⑤ 比较典型的哈拉夫文化遗址包括Sabi Abyad、Ras Shamra、Arpachiyah、Yarim Tepe、Domuztepe、Takyan等。参看：Akkermans和Duistermaat 1996 [4]，第21—30页；Akkermans 2000 [6]，第46—47页；N. Ya. Merpert和R. M. Munchaev 1987 [7]，第28页；Stuart Campbell 2000 [8]，第16页。

⑥ 参考E. Henrickson 1988 [9]，第1—19页。

⑦ 此处“非入侵式”指向哈拉夫文化的过渡，并非经由外来族群的入侵，而是本地族群在物质文明上的一系列转变，这种转变广泛地发生在所谓“哈拉夫文化圈”内的遗址上，并且和这些遗址原有的一些特色共存。参看Stuart Campbell 1992 [10]，第182—185页。

⑧ 参考Stuart Campbell 1992 [10]，关于重要的哈拉夫遗址及其年代分野参看Cruells, etc. 2004 [11]，第50页。

同，这显然是落后文明向先进文明仿效的结果，而印章作为部落经济手段中非常重要的见证和标记工具得到了普及。

同时，哈拉夫时期开始出现以聚落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组织，如Domuztepe^①的黑曜石印章和珠子加工作坊^②。为了处理硬度和加工难度较高的黑曜石，平面印章、珠子、护身符分别经由不同分工来粗切、制作成型和打磨。由于打孔技术的限制，Domuztepe生产的黑曜石印章往往采用一类近于扁平的外形，有时不制作印钮而直接在印背打V形孔以佩戴。我们认为，印章生产的专业化同样也证明了哈拉夫时期印章使用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 and 叙利亚地区的广泛普及。在同时期，其对硬质矿石材料的加工趋于全球领先地位。大量使用硬质的燧石、玉髓^③等石英质矿物作为工具，对硬度稍软的黑曜石等印章材料进行加工。

公元前3700年后的后期乌鲁克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城邦以富余的农牧资源在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城市化进程中的乌鲁克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层级体系的形成以及更为复杂的管理手段^④的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变革导致的更复杂的行政管理需求，促使乌鲁克人发明了原始苏美尔文字和滚筒印章（图6）。早期滚筒印章上非常具象的纹饰，如表现建筑、酿酒、农牧生产和祭祀等题材，也暗示着它们的使用者可能隶属于和这些职能相关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滚筒印章的戳记上更为复杂而生动的场景也可以补充原始文字表达能力上的缺陷^⑤。两河流域传统的平面印章依然作为个人标识用于一般的私有物品仓储和贸易（图7），和滚筒印章共同使用一直到公元前三千纪早期。我们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的出现，行政管理机构的健全，印章也从个人标识进化到行政权力的象征。

由于乌鲁克在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滚筒印章的使用也迅速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



图6 乌鲁克时期（公元前3400—前3100年）滚筒印章及现代戳记，含沥青的石灰石材质（采自Holly Pitterman等 1987 [35]，第52—53页）



图7 石质平面印章，乌鲁克晚期至杰米迭特·纳斯尔时期（私人收藏）

① 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

② 参考Ellen. H. Belcher 2011 [12]。

③ 此处对应英文中的Chalcedony，是一大类隐晶质天然石英质矿物的统称，包括玛瑙（agate）、红玉髓（Carnelian）、鸡血石（Heliotrope，俗称Blood Stone）、鸡肝石（Jasper）、缟玛瑙（Onyx）等。

④ 如：计数用陶筹、泥板、滚筒印章等。

⑤ 参考K.J.Roach 2008 [13]，第663—664页。该文述及原始埃兰文字和滚筒印章戳记的关联，考虑到乌鲁克时期的原始苏美尔文字和原始埃兰文字经历了极其相似的起源过程，所以可以类推。

和巴勒斯坦地区^①、安纳托利亚东南^②、前王朝时期的埃及^③，以及伊朗西南部的埃兰^④。

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乌鲁克文明为中心的贸易圈逐渐崩溃，而新的远距离贸易路线串联起了两河流域到中亚的诸个重要文明，并形成了两个交互作用域^⑤，即从两河流域南部、Diyala河谷^⑥到波斯湾、伊朗东南部，并一直延伸到 Tepe Yahya^⑦的杰米迭特·纳斯尔（Jemdet Nasr）^⑧交互作用域；从Kopet Dagh^⑨山麓向南延伸到Helmand^⑩地区中心和Quetta河谷^⑪的北方交互作用域。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三千纪以后一些重要的贸易商品^⑫在这些交互作用域所覆盖的庞大地理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有出土，证明交互作用域内存在有组织的物质交流；同时，在Tepe Yahya和其附近的Shahdad^⑬，以及Helmand地区的Shahr-i Sokhta^⑭均发现了滚筒印章，其纹饰风格体现出伊朗西南部原埃兰文化^⑮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这些交互作用域内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印章的进一步东传，并且此时贸易网络的枢纽已经从两河流域南部转移到了伊朗地区。这为后来印章使用的进一步东传提供了条件。

印章的西传

埃及在最初引入滚筒印章后，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又开始同时使用平面印章^⑯。我们认为，以纸莎草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埃及对于滚筒印章的依赖性远少于两河流域，因此更为轻巧简单的平面印章得以发展流行。至十一王朝（公元前2061—前1991年），圣甲虫形式的平面印章开始成为主流（图8、图9），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古埃及印章的纹饰题材除了纯装饰性题材外，主要为带有宗教和庇护性质的动物、神祇形象，以及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人物、神祇名称和赞美、祈祷的语句等。中王国末期，由圣甲虫印章衍生出了龟背穿

① 资料来源于Gil J. Stein 1999 [14]，第15页；Geoff Emberling和Helen McDonald 2003[15]，第18—20页。

② 参考Gil J. Stein 1999 [14]，第15、17页。

③ 早于公元前3100年，参看Sparavigna 2009 [1]，第16—17页。

④ 苏撒二期后期，公元前3300—前3100年。参看K.J.Roach 2008 [13]，第56—57页。

⑤ 交互作用域（Interaction Sphere，又翻译成交互作用圈、相互作用圈）指密集的不同文化间的有机交流过程，体现在细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大范围的物质交换（参看Elisa Cortesi, etc. 2008 [16]，第6页）。关于西亚至中亚的两大交互作用域参看Elisa Cortesi, etc. 2008 [16]，第7页。

⑥ Diyala河是底格里斯河的支流，东起伊朗扎格罗斯山脉上的哈马丹，向西流入底格里斯河。Diyala河谷是古代两河流域到伊朗地区的重要贸易通道。

⑦ 伊朗东南部的考古遗址，位于Kerman省。

⑧ 杰米迭特·纳斯尔时期指两河流域中南部公元前3100—前2900年的考古文化层，其代表遗址为伊拉克巴比伦省的杰米迭特·纳斯尔遗址。

⑨ Kopet Dagh又名土库曼斯坦—呼罗珊山脉，位于土库曼斯坦和伊朗边界，沿里海东南界，总长650千米。

⑩ Helmand是阿富汗南部最大的省份，以其为中心的Helmand文明由M.Torsi首先提出，繁荣于公元前2500—前1900年。

⑪ 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卑路支斯坦西北。

⑫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伊朗东南部生产的绿泥石雕刻容器。

⑬ 伊朗东南部的考古遗址，位于Kerman省，现为Kerman省Shahdad区的省会。

⑭ 伊朗东南部的考古遗址，位于锡斯坦和卑路支斯坦省，属于Helmand文明。

⑮ 原埃兰时期（Proto-Elamite），公元前3100—前2700年，参看Sylvia Winckelmann [17]，第61—62、70—71页。

⑯ 参考Sparavigna 2009 [1]，第19页。



图8 古埃及圣甲虫印章，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650—前1550年），费昂斯材质（私人收藏）



图9 古埃及圣甲虫印章，新王朝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滑石材质（私人收藏）



图10 古埃及双面牌形印章，新王朝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滑石材质（私人收藏）



图11 米诺文明晚期（公元前1600—前1450年）橄榄形圆板穿带印章，黑色碧玉（鸡肝石）或地方玉质（私人收藏）

带印和方形牌印（图10）等类圣甲虫印章，至十八王朝末期雕刻印章戒指开始大量出现^①。

公元前2500年，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起，爱琴文明的早期米诺文明II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和多面立体印。同时期希腊的赫拉迪克（Helladic）早期大陆文明也出现了较为原始的平面印章^②。米诺文明晚期（公元前1600—前1450年），则流行橄榄形和圆板穿带印章（图11^③），并曾短暂引入过滚筒印章。

印章的东传

印度河谷文明位于之前所述两个文化相互作用域的东南边缘，是为贸易网络上重要的原料和加工技术提供方，在乌尔王墓出土的印度河谷风格红玉髓管子和金质叶形头饰即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种技术和原材料有向东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公元前3300—前2800年这里已有使用陶质或骨质的印模，其底面通常雕刻有交叉直线、十字、同心圆等具有特殊的社会或宗教含义的几何纹饰。至公元前2800年后，印度河谷步入迅速城市化进程，带有类似纹饰和印度河谷文字的石质印章出现（图12），并出土了带有对应戳记的封泥，是为印章在印度河谷开始使用的证据^④。

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类似的几何纹饰平面印章在Shahr-i Sokhta也有出土^⑤，这显示印度河谷地区和Helmand文明乃至前文提到的两大交互作用域之间在印章传播上的作用是双向的，即外来的

① 以上关于古埃及印章的资料均来源于Sparavigna 2009 [1]，第21—24页。

② 参考John Boardman 2001 [18]，第21—22页。

③ 此处“鸡肝石”（又名“鸡肝玛瑙”），即对应英文中的Jasper，中文一般翻译为“碧玉”，但是容易和透闪石类的碧玉（软玉的一种）混淆，故此处使用其俗称“鸡肝石”。黑色鸡肝石实际可能为颜色较深的棕褐色或墨绿色。

④ 参考J.M.Kenoyer 2001 [19]，第7、10页。需要说明的是，Kenoyer在同一篇论文中将公元前3300年开始出现的陶制印模作为印度河谷最初的印章，但是此类器物的耐用性不及石质印章，且笔者未见有对应戳记的出土记录，所以在此文中我们只认其作为印度河谷本地的印章雏形，而不认定为印章。但是此类印模很可能已有标识个人身份的功能。

⑤ 参考Elisa Cortesi, etc. 2008 [16]，第20—22页。

影响引发了印度河谷对印章的使用，而印度河谷在印章形状和内容上维持了本地化特征，并反过来影响了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地区。这种双向作用在此前已经提及的古埃及文明和米诺文明发展过程中也有体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印章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也再次证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地理学家的分析，最晚到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湾的海岸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沼泽和湖泊，使乌尔、Eridu等城市可以直接通过船舶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少量来自波斯湾的贸易品^①。至公元前三千纪早期，这一贸易线路逐渐扩展并囊括了埃兰、阿曼（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古称Magan）和印度河谷这三大区域的文明。波斯湾地区占据主导的迪尔蒙（Dilmun）文明（公元前3000—前800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大量低钮圆形平面印章^②（图13）。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达到鼎盛，并引入少量滚筒印章。我们由迪尔蒙文明印章纹饰的变化可以明确地观察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印度河谷的双重影响，但是在外形上维持了其特色。

公元前3000年后，受到来自印度河谷和伊朗的双重影响，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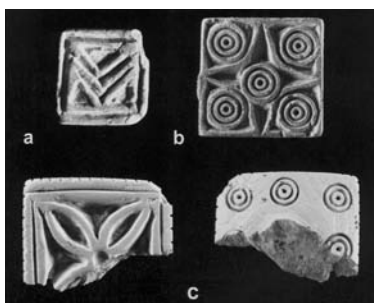


图12 哈拉帕出土的印度河谷印章，科特·迪吉（KotDiji）时期（公元前2800—前2600年），滑石材质（资料来源于J.M.Kenoyer 2006 [36]，第22页）



图13 迪尔蒙文明平面印章，公元前2000年前后，软石质（采自Harriet Crawford 2001 [21]，第62页）



图14 BMAC阳文铜质印章，公元前2500—前2000年（私人收藏）



图15 BMAC镂空铜质印章，公元前2200—前1800年（私人收藏）



图16 BMAC铜质人物印章，公元前2200—前1800年（采自朱晓丽2013 [5]）

① 参考Christopher Edns 2016 [20]，第118页。

② 参考Harriet Crawford 2001 [21]。

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文明体（简称BMAC）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①。BMAC文明有着成熟的农业灌溉系统，擅长制造铜器，是积极的贸易参与者。早期BMAC文明使用的主要为阳文铜质平面印章（图14），至公元前2300年后开始流行石质双面方形穿带印、石质带钮平面印章^②以及镂空铜质平面印章（图15）。两类不同材质印章的纹饰存在相似性，而由同时期出土的封泥上的戳记推断，使用的多数为石质印章。两类印章显然是并存关系，但是使用的载体材质存在区别。BMAC印章的纹饰包括大量的放射形几何纹饰，以及各种动物和神话题材纹饰，其中后者明显地受到伊朗的杰罗夫特（Jiroft）^③、埃兰等文明的影响（图16）。同时，在BMAC文明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印度河谷印章及其仿制品，体现出印度河谷的影响。BMAC印章的分布范围极广，甚至远及中国新疆。除了贸易网络的作用外，其近邻——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游牧文化^④——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公元前2400年后，进入成熟期的印度河谷文明开始使用一类带钮方形滑石平面印章；纹饰主要是动物、植物和人物，并带有印度河谷文字（图17）。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在波斯湾地区和伊朗出现了一些带钮圆形平面印章，即类似前文所提到的波斯湾印章，但其纹饰结构却非常接近印度河谷平面印章，这类印章的雕刻手法较印度河谷印章拙劣，部分文字也不符合印度河谷的传统。我们认为这也是印章传播过程中文明间双向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印章是波斯湾印章对印度河谷印章的模仿，它的制作者可能是波斯湾或伊朗的工匠，而使用者很可能是往来于印度河谷的商人。

公元前1800年后，可能由于河道改变、洪涝、海岸线移动或雅利安人入侵等原因^⑤，印度河谷文明逐渐崩溃，由此导致依赖于印度河谷贸易的一些文明如BMAC和迪尔蒙文明等的衰退。而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些失去活力的文明中，印章的使用陷入衰退甚至完全消失的局面。印度河谷居民中的一部分向恒河流域迁徙，并将印章的使用传播到恒河文明。相比之下，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包括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由于陆上贸易线路的继续活跃，使这些文明继续保持着活力，滚筒印章也继续得到沿用（图18、图19）。



图17 印度河谷成熟期（公元前2300—前1700年）方形平面印章，滑石烤制并上釉（私人收藏）



图18 旧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800—前1600年）两河流域滚筒印章，玛瑙质（私人收藏）



图19 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世纪—前6世纪）滚筒印章，黑色石质（私人收藏）

① 早期报告将大部分BMAC的印章归于青铜时代中晚期，即公元前2200—前1800年之间，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其中一些类型是受到早期印度河谷文明影响后出现，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关于BMAC印章详细断代参看Sandro Salvatori [22]。

② 单面的石质带钮平面印章中一类方形印章实际为印度河谷的早期印章或其变形，参看Sandro Salvatori [22]，第128—129页。

③ 位于伊朗中南部。

④ 公元前2000—前900年活跃于西西伯利亚和亚洲西部草原。

⑤ 印度河谷文明的衰退问题尚存在争议，或可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的讨论可以参看George F. Dales 1966 [23]，Malati J. Shendge 1990 [24]，Sarman和Akkaraju 1977 [25]，Possehl和Gregory L. 1967 [26]等。

希腊印章的兴起和东传

古希腊印章的起源和发展间接地受到古埃及文明的影响，直接的影响则来自近东文明如腓尼基、叙利亚等。

虽然古埃及文明最终放弃了圣甲虫印章的使用，但却对地中海周边地区的许多文明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受其直接影响的包括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公元前1500—前110年）、腓尼基、叙利亚和犹太文明等。

古希腊文明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已出现了平面印章（图20）和圆板穿带印章（图21）。早期的古希腊人对于青铜时代的圆板穿带印必然有一定了解：麦锡尼和米诺文明的遗民可能依然将其作为护身符佩戴，而希腊人也可能在早期遗址地表捡到此类印章。而在受到东方文明影响开始使用印章后，他们即尝试仿刻圆板穿带印章并作为早期的一类主要印章形制^①。这种情况和上文提到的印度河谷存在相似性；同时，古希腊文明使用的印章形制更为多样，体现出印章受贸易和文化影响的复杂性。

此后，受腓尼基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明也引入了圣甲虫印章护身符^②；至古典时期（公元前5—前4世纪），镶嵌和雕刻的印章饰物^③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图22），影响包括古希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文明和早期罗马等。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和腓尼基文明都是地中海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两者在印章上的发展也都依赖于贸易和扩张所带来的活力，特别是更具开放性的古希腊文明大量吸收了腓尼基和东方艺术，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极具艺术性的印章雕刻风格。

古罗马文明（公元前5—前4世纪）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希腊的大量文化元素，至帝



图20 希腊平面印章，公元前8世纪，白色石灰石（采自John Boardman 2001 [18]，第116页图版）



图21 古希腊橄榄形穿带印，公元前8—前6世纪，滑石材质（采自John Boardman 2001 [18]，第116页图版）



图22 希腊化时期雕刻印章戒指，公元前2—前1世纪，金质（私人收藏）

① 参考John Boardman 2001 [18]，第107—108页，第119页。

② 虽然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有密切的交流，但圣甲虫更可能是自腓尼基传入，参看John Boardman 2001 [18]，第139—140页。

③ 主要为戒指、护身符等。

国时期，佩戴印记戒指成为常态（图23）。

在西亚，公元前9世纪后，由于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出现和流行，楔形文字和滚印的使用逐渐受到约束，而开始流行塔形平面印章^①（图24、图25），但题材依然以宗教性的祭祀场景、神祇徽记为主。公元前7世纪，希腊商人在黑海东岸和北岸建立贸易殖民地，通过和斯基泰人的贸易最早将希腊文明的影响力传入西亚和中亚^②。至公元前5世纪，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③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龟背穿带印章（图26）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这两类印章和传统的楔形平面印章逐渐取代了滚筒印章，后者在公元前5世纪后即不再生产^④。

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东征，希腊文化更深入地渗透到西亚和中亚文明的血脉中，这一过程史称“希腊化”。亚历山大帝国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希腊殖民地都沿用了希腊式的龟背穿带印章（图27）和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图28），取代了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和楔形平面印章。在这些地区此后兴起的王朝如中亚贵霜王朝（公元30—375年）、帕提亚波斯帝国（公



图23 罗马帝国时期雕刻红玉髓印章戒指，公元1—3世纪，镶嵌在拜占庭时期或更晚期的银质戒托上（私人收藏）



图24 新巴比伦时期楔形平面印章，公元前7—前6世纪，玉髓质，镶嵌现代金托（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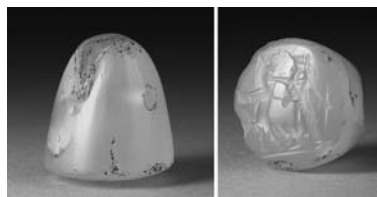


图25 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时期楔形平面印章，公元前6—前4世纪，白色玉髓质（私人收藏）



图26 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时期龟背穿带印章，希腊—波斯风格（公元前5—前4世纪），玉髓质（采自John Boardman 2001 [18]，第308页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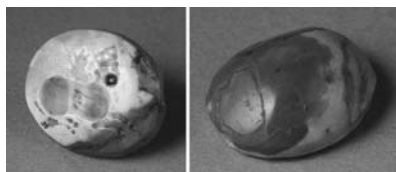


图27 希腊化时期龟背穿带印章，公元前3—前1世纪，制作于西亚或中亚，玛瑙材质（私人收藏）



图28 中亚雕刻印章戒指，公元2—5世纪，铜质（私人收藏）

① 新亚述时期至阿契美尼德时期流行的此类平面印章，在西方学术报告中常称为pyramid stamp seal或pyramid seal，直译成中文为“金字塔形平面印章”。由于“金字塔”一词具有较强的地域和文化指向性，容易造成误导，故本文中译作“塔形平面印章”。

② 参考John Boardman 2015 [27]，第25页。

③ 主要为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如萨尔迪斯、达西利翁、吕西亚、西西里亚等，参看John Boardman 2001 [18]，第304页。

④ 参看朱晓丽 2013 [5]，第66页。

元前247—224年)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都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我们认为希腊印章的优势在于题材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富有个性的神祇和英雄,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普通人如士兵、商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男欢女爱的描绘都可以成为印章的题材。我们也观察到西亚和中亚的文明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筛选、改造和重新诠释,比如中亚就将酒神狂欢的表现手法引入了印度教中与湿婆相关的题材^①。而正是这一融合过程,大大丰富了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印章纹饰题材。

我们比较了希波战争时期受希腊影响的波斯印章和希腊化时期中亚和西亚的印章(参看图26、图27),可以发觉两者在形状上接近,在雕刻手法上也存在关联,特别是砣线和钻点的使用显示出更加熟练和素描化的趋势,可见印章上的希腊化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部分地区由于斯基泰文明的影响,可能开始的时间更早。

萨珊波斯帝国(公元224—651年)兴起后,出现了半球形、半算珠形和戒圈形印章(图29—31),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图32、图33)共同使用;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②。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火坛、人头翼牛等。根据出土印章和封泥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同罗马帝国一样,萨珊王朝时期印章的使用也大大普及,且存在较严格的官方用印规制,比如:萨珊王朝的军队统帅使用专门的纹饰题材为骑士的印章,其四周详细注明官员姓名、统辖范围和封号等,而用于官方事务的封泥往往带有指定了官职和适用地域但没有人名官印戳记^③,官印戳记和私人戳记往往组合使用以保证封泥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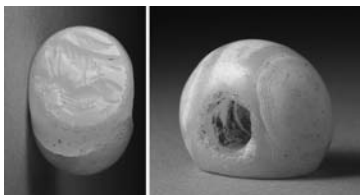


图29 萨珊波斯王朝时期半算珠形印章,公元224—651年,玉髓材质(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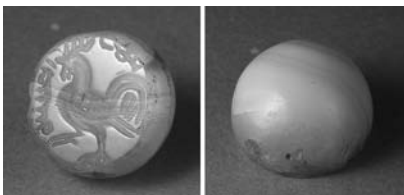


图30 萨珊波斯王朝时期半球形印章,公元224—651年,玛瑙材质(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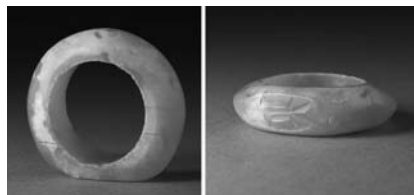


图31 萨珊波斯王朝时期戒圈形印章,公元5—7世纪,玉髓材质(私人收藏)



图32 萨珊波斯王朝时期金质镶嵌印章戒指,公元224—651年,雕刻印章戒面为红白缟玛瑙材质(私人收藏)



图33 萨珊波斯王朝雕刻印章戒面,公元224—651年,红玉髓材质(私人收藏)

① 参考Aman Ur Rahman和Harry Falk 2011 [28],第24—25页。

② 参考Gyselen 2006 [29],第25页。

③ 参考Gyselen 2006 [29],第34—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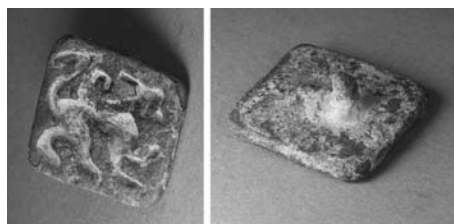


图34 中亚“丝路印”，公元2—7世纪，
铜质（私人收藏）



图35 中亚“丝路印”，公元2—7世纪，
铜质（私人收藏）

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前187年）和贵霜早期（公元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属国后^①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形平面印章；而印度河谷至次大陆则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其印章形式依然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的则体现出中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②

公元2至7世纪，中亚丝绸之路之路上出现了大量的平面印章（图34、图35），其中部分的外形和中国战汉印章类似，且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粗糙。此类印章被新关钦哉归入“Silk Road印”中^③，认为可能是丝绸之路贸易用印^④。我们认为此类印章可能和青铜时代中亚（即BMAC文明）铜印有着传承关系^⑤，但是由于BMAC文明崩溃后中亚地区出土印章资料的匮乏，这一猜测尚待证实。我们还注意到其中一些铜印的纹饰和先秦、汉代铜印存在相似性，这显示出当时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双向作用。随着希腊化印章的东传，不同的文化地域对印章的不同审美也逐渐凸现出来。原本源自于地中海文明审美意识，以写实为主的表现手法也在逐步东传中表现出写意和抽象化的特征。虽然在雕刻工具上中亚具有较先进的砣钻工艺，但源于当地审美的概念化，导致图案印章趋于简约的表现。

关于中国古玺的起源

我国的印章文化，具有三千年历史且未有中断，并在周秦两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艺术高峰。中国古玺起源，过去有人认为其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玺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随着近年国内外考古报告的不断发表和国外印章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在中亚、西亚、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存在着比我国更早

① 事在公元240年前后。

② 关于中亚的印章，可以参考Aman Ur Rahman和Harry Falk 2011 [28]。

③ 参考新关钦哉1995 [30]，第23—26页。

④ 新关钦哉将中亚出土的多种石质和金属印章都归入了“Silk Road印”，现在看来其中一部分，尤其是镶嵌印章饰物和半球形/半磨盘形印章，应该是受希腊化或萨珊文化影响下本地工匠的作品。而方形铜印在形式上和希腊及萨珊均有区别，但图案上却和同时期其他中亚印章有着相似性，故我认为其来源有所不同。

⑤ 新关钦哉在书中也提到了青铜时代玛鲁珈娜（即马尔基亚娜）地区出土的铜印，参看新关钦哉1995 [30]，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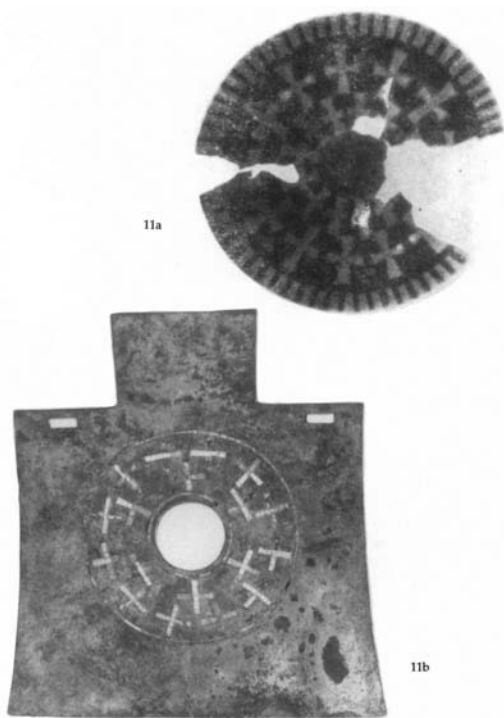


图36 出自偃师二里头的镶嵌绿松石铜镜（上图）和上海博物馆藏商代铜钺（下图），均带有十字纹饰（采自Fitzgerald-Huber 1995 [31]，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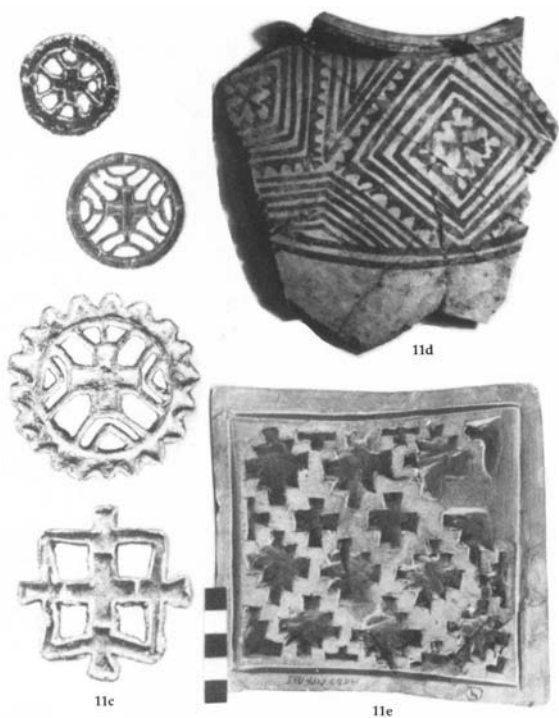


图37 BMAC铜质印章（左四件），土库曼斯坦南部AltynTepe所出土陶罐残片（右上）和土库曼斯坦南部Ak-tepe所出土陶盆（右下），均带有十字纹饰（采自Fitzgerald-Huber 1995 [31]，第55页）

的印章。同时，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BMAC文明和商代文字、器物纹饰之间的相似性，如安诺遗址出土的公元前2300年的带文字方印。Fitzgerald-Huber^①则观察到BMAC文明铜印上的十字纹饰和偃师二里头所出铜镜以及铜钺上的十字纹饰的相似性（图36、图37），并指出安德罗沃诺文化可能是联系BMAC和中原文化的桥梁。Salvatori提到了新疆出土的青铜印^②（图38），并归在BMAC文明的一类青铜印中。因此，值得大胆猜想，作为中华古玺的滥觞，以BMAC为代表的来自中亚的文化和印章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是其起源。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玺的话，那么，我国古玺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印章在产生后有西传和东渐的两条不同线路。印章在地中海文明哲学体系指导下，呈现出精细且写实的雕刻风格，体态均匀，分毫毕现。但在希腊文明逐步东传的进程中，渐渐受各地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在图案表现上出现天马行空一般的广泛内容，并使用更先进的砑钻工具制作较为概括和简练的内容。这是东西方哲学指导下，在美学价值观上的巨大反差。并且在我国古玺肖形印制作中融入中国传统哲学和审美概念，以一为一，以一化万，达到抽象中见神采、简练中现精神的境界，成为既高度概括且具有很大大想象空间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因为西方文明在语言和文字上的

① 参考Fitzgerald-Huber1995 [31]，第52—65页。

② 参考Sandro Salvatori 2000 [22]，第106页，和黄文弼 1958 [32]，图版壹玖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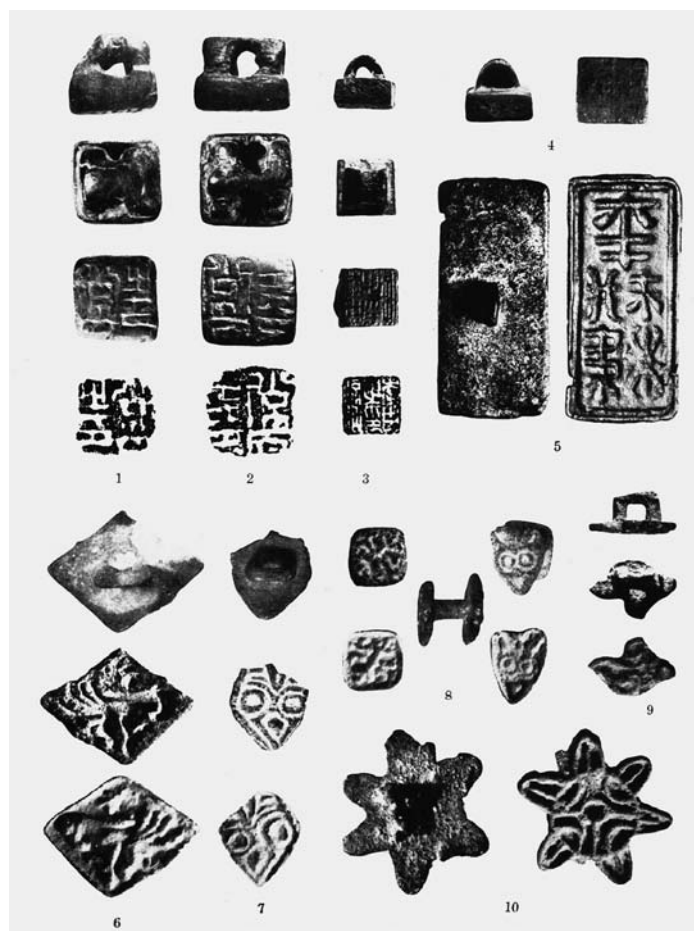


图38 新疆出土的BMAC铜印（图中右下标号10）（采
自黄文弼 1958 [32]，图版壹玖零）

巨大限制，每个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一个简单的含义也需要较长的字母组成。所以西方印章最后还是停留在以图案、族徽和花体字母的表达形式，载体也是以封泥、铅封、火漆而保留下来，其使用的范围也逐渐缩小，逐渐式微。而汉字有良好的指意功能，具有高度简练的表达作用，一字乃至寥寥数字的印文就可以精准表达复杂的鉴证等功能。所以在中华文明中以文字为主流的印章可以代代相传，延续三千余年。其使用之广泛，艺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为海内外所公认。然而此已非本文所要表述之义。

世界古代印章在使用、象征、目的上，和我国古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对史前印章的研究对我国古玺文化溯源必有很大帮助。自公元前2000年始，西北已有类似中亚的青铜印章；至于战、汉，则中原肖形印与中亚、丝绸之路印章也有颇多相近之处；自六朝以降，虽然中西印章在内容和用法上分道扬镳，中原居民的墓葬中仍偶尔会发现源自西方（波斯、中亚）的印章，其中既有旅居汉地的胡人后裔（如史诃耽），也有身份显赫的汉人将领（如徐显秀）。这些遗物虽不足以完全揭开印章起源的谜团，却为我们研究印章的传播乃至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国内考古界而言，研究和解读这些珍贵遗物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古玺的崛起和发展

是世界印章发展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需要在古代世界的广阔视野内去重新审视它的地位和价值。据2016年7月20日《今日美国报》报道，中国考古学家将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谷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在未来的五到七年中与印度考古学家合作研究。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走出国门的考古合作，可以从科学考古角度更好地辨析中国古玺的起源。

（一）

据新华社报道，陕西渭南市境内出土一西周“龙钮玉印”，底面为凹面，以阴刻线条作十字格分割，格内有四个图案。据专家称，分别为“龙”或“蜀”、“鹿”、“虎”和“鹰”（图39），认为其是中国最早的玉质古玺。

对此器物的古玺说，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两周时期金文系统已较完善，族徽的使用已趋于衰退，同时代肖形印趋于具象化。其次，此件底端为凹面，且为较浅的线刻，不符合当时古玺和封泥的使用关系。另，在殷墟妇好墓中有同类器物出土^①（图40、图41），定为“石器盖”，其整体外形、钮式花纹皆与渭南所出如出一辙，当是相同器物。所以，我们认为渭南所出似不应称作古玺。



图39 陕西渭南出土“龙钮玉印”
（来自网络）



图40 殷墟妇好墓出土龙钮石器盖线描图
（图中编号1）（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4 [33]，第360页）



图41 妇好墓出土龙钮石器盖照片（摘自河南博物馆等 2016[34]，第61页）

^①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4 [33]，第360页；河南博物馆等 2016 [34]，第61页。

(二)

近十年,肖形印是中国当代篆刻界非常热门的创作门类,上承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肖形印传统,又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肖形印大多以青铜为材料,或浇铸,或篆刻,入土几千年,出土大多图案弥漫古拙,而国外肖形印多以宝石或矿石为材料,出土后基本没有腐蚀,图案清晰细腻,与我国肖形印呈现巨大区别。中国有尚古、崇古、拟古之风,近代篆刻大家皆好此种古拙之美,并以此种审美创作肖形印。篆刻界所制作肖形印以具象图案为主流,开一片大好新气象,除传统图案生肖印之外,以佛教题材、人物照片为范本的比比皆是。其形象之逼真,用刀之精准,为古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代照相、扫描、西方素描技术的篆刻表现,与传统篆刻中古拙的审美情趣有异,而更接近于剪纸、皮影、版画。古代肖形印在封泥作为载体的情况下,呈现出较为立体的高度概括的浮雕图案,即使使用印泥打在平面纸上,在红与白之间产生微妙的过渡层次,也就是相对于“实”来说的一种比较“虚”的效果,在视觉上产生一定的厚度,在二维空间呈现出一种貌似三维的立体效果。总之,它以简胜繁,简中见神韵,令人遐想神往。以拙之见,借古开今,当代肖形印似有更广袤的开拓空间和多元的表现手法。

要之,产生于西亚的图章印,在我国洋为中用、脱胎换骨、独具特性,获得了本土化的新生。

(作者系韩天衡美术馆艺术总监、西泠印社社员)

参考文献

1. Amelia Carolina Sparavigna 2009, 《Ancient Egyptian Seals and Scarabs》.
2. Kim Duistermaat 2010, “Administration In Neolithic Societies? The First Use Of Seals In Syria And Some Considerations On Seal Owners, Seal Use And Private Property”, 《Die Bedeutung der minoischen und mykenischen Glyptik》, CMS-Beiheft 第八期。
3. Kim Duistermaat 2012, “Which Came First, the Bureaucrat or the Seal? Some Thoughts on the Non-Administrative Origins of Seals in Neolithic Syria”, 《SEALS AND SEALING PRACTICES IN THE NEAR EAST: Developments in Administration and Magic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slamic Period》, Orientalia Lovaniensia Analecta 第219期。
4. P.M.M.G. Akkermans 和 Kim Duistermaat 1996, “Of Storage and Nomads-The Sealings from Late Neolithic Sabi Abyad, Syria”, 《Paléorient》第22(2)期。
5. 朱晓丽, 《珠子的故事》, 2013年版。
6. P.M.M.G. Akkermans 2000 “Old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Halaf-Culture”, O. Rouault and M. Wäfler 编订, Brepols 出版, 2000年。
7. N. Ya. Merpert 和 R. M. Munchaev 1987, “The Earliest Levels at Yarim Tepe I and Yarim Tepe II in Northern Iraq”, 《Iraq》第49期, 1987年。
8. Stuart Campbell 2000, “The Burnt House at Arpachiyah: A Reexaminatio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第318期, 2000年。

9. E. Henrickson 1988, "Chalcolithic Seals and Sealings from Seh Gabi, Central Western Iran", 《Iranica Antiqua》第23期, 1988年。
10. Stuart Campbell 1992, "The Halaf Period in Iraq: Old Sites and New",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第55期第4号, 1992年。
11. Cruells, Walter和Nieuwenhuys Olivier 2004, "The Proto-Halaf Period in Syria. New Sites, New Data", 《Pal é orient》第30期第1号, 2004年。
12. Ellen. H. Belcher 2011, "Halaf bead, pendant and seal 'workshops' at Domuztepe: technological and reductive strategies", 《Studies in Early Near Eastern Production,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第13期, 2011年。
13. K.J.Roach 2008, 《The Elamite Cylinder Seal Corpus, c.3500—1000 BC》。
14. Gil J. Stein 1999,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y: the Evidence for a 4 TH Millennium BC Mesopotamian Uruk Colony at Hacinebi, Turkey", 《Pal é orient》第25期第1号, 1999年。
15. Geoff Emberling和Helen McDonald 2003, "Excavations at Tell Brak 2001—2002: Preliminary Report", 《伊拉克》第65期, 2003年。
16. Elisa Cortesi, Maurizio TOSI, Alessandra Lazzari和Massimo Vidale 2008,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yond the Iranian Plateau: The Helmand Civilization, Baluchistan and the Indus Valley in the 3rd Millennium BCE", 《Pal é orient》第34期第2号, 2008年。
17. Sylvia Winckelmann 2000,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Iran, the Murghabo-Bactrian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Northwest India and Failaka in the Field of Seal", 《East and West》第50期第1/4号, 2000年。
18. John Boardman 2001, 《Greek Gems and Finger Rings: Early Bronze Age to Late Classical》, 2001年, Thames& Hudson。
19. J.M.Kenoyer 2001, "Early Development of Art, Symbol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 Valley Tradition", INDO-KOKO-KENKYU第22期, 2001年。
20. Christopher Edns 2016, "Dynamics of Trade in 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World System'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新系列第94期第1号, 2016年。
21. Harriet Crawford 2001, 《Early Dilmun Seals from Saar: Art and Commerce in Bronze Age Bahrain》,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y》2001年版。
22. Sandro Salvatori 2000, "Bactria and Margiana Seals: A New Assessment of Their Chronological Position and a Typological Survey", 《East and West》第50期第1/4号, 2000年。
23. George F. Dales 1966, "The Decline of Harappans", 《SCIENTIFIC AMERICAN》第214期第5号, 1966年。
24. Malati J. Shendge 1990, "FLOOD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 《FLOOD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第71期第1/4号, 1990年。
25. Sarma和Akkaraju 1977, "Decline of Harappan Cultures: A Re-look", 《East and West》第27期第1/4号, 1977年。

26. Possehl, Gregory L.1967, “The Mohenjo-daro Floods: A Repl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69期第1号, 1967年。
27. John Boardman 2015, 《The Greeks in Asia》2015年版。
28. Aman Ur Rahman and Harry Falk 2001, 《Seals, Sealings and Tokens from Gandhara》, 2001年。
29. Rika Gyselen2006, 《Sasanian Seals and Sealings in the A.Saeedi Collection》, Acta Iranica, 2006年。
30. 新关钦哉著, 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 2003年。
31.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1995,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第20期, 1995年。
32.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图记》,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4. 河南博物馆等:《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玉器篇》, 解放出版社2016年版。
35. Holly Pittman, Joan Aruz, 《Ancient Art in Miniature: Near Eastern Seal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artin and Sarah Cherkasky》,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展览图录)1987年版。
36. J.M.Kenoyer2006, “Indus Seals: An Overview of Iconography and Style”, 《Ancient Sindh: Annual Journal of Research》第九期, 2006—2007年。
37. 本文所用图片中所注明“私人收藏”, 皆为国内藏家藏品, 此前均未在国内外文献上发表。